

观念演绎下的“妖魅精怪”

——寻根文学的民间叙事探析

翟星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寻根文学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流派。部分寻根作家对抗主流话语,立足于民间立场塑造大量的“民间人物形象”,以民间人物作为创作基点,真实客观地向读者展示民间社会现象和暴露民间“非人化”的问题。寻根作家通过民间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对抗主流话语曾经对民间的曲解,利于读者对民间悲剧形象的感知和对自然生命意识的掌握,也造成当代意识中现实主义缺失的负面效用。

关键词:观念演绎;寻根文学;民间;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508(2018)08-0113-03

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以“民间”作为立场备受学者关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进入繁荣期,在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之外,民间话语大量地涌现,许多寻根作家立足于民间立场进行创作,并由此认同民间的审美原则。“民间”作为审美的文化空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是自由自在,充分表达民间突出的问题和长期被压抑的生命诉求,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比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代言更能真切地反映社会问题。然而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形象生成的角度看,都呈现非常态的现象。曾有学者归纳总结非常态民间人物形象有怪类、活鬼式、妖化神魔化等类别,举例和分析各类形象,并指出虽然这类形象因非常态的塑造而缺乏深入揭示人性深度的力度,但具体到每个人物形象和作品时,其意义和价值又不能一概而论。“民间”一词很早就被激烈讨论过,据以往学者的论述“这里的民间不是传统的民间社会,专指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具体地说,自 20 世纪以来学术文化势力分裂为三分天下,即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文化形态、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形态及保存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在寻根文学大潮涌起之际,莫言、汪曾祺等作家也以寻根文学作品对抗主流话语,立足于民间立场塑造了大量的“民间人物”形象,以民间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向读者展示民间社会现象和暴露民间“非人化”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效用。众多作品中,都存在非常迥异的民间人物形象,呈现出人与非人因素相结合、非常态的文学现象。最典型的是莫言《红高粱家

族》中戴凤莲和汪曾祺《受戒》中明海两位民间人物形象。莫言和汪曾祺通过民间人物形象塑造对抗主流话语曾经对民间的曲解,有利于读者对民间人物形象的印象加深和对自然生命意识的独特把握。

一、民间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为寻根文学作家,由于对寻根的追求,他们在创作姿态上拒主流文学于千里之外,总体上呈现民间化叙事倾向,以民间作为叙事立场,从民间的角度出发叙写故事,从而在寻根文学的作品中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人物,而民间人物也成为作家进行人物塑造的重点,他们将千姿百态的民间化人物通过观念演绎的方式塑造出来。寻根作家采用的民间人物形象除了从生活中提炼之外,还从某种理念出发,用观念先行的方式,把自己思考的某种观念加在作品人物身上,由于“塑造出来的民间形象不再是生活逻辑的产物,而有些像来历特殊却具有神秘魅性的超自然蛊惑物。”这类形象承载了作者的某种理念,成为来历不明的超自然的蛊惑物。而根据这类形象的特点可具体分为“妖魅化”和“精怪化”两类形象。“妖魅”强调事物的反常性,“精怪”强调事物演化结果的超常性。

1、“妖魅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妖魅化”人物强调的是具有的不同常态的生命形式。这类形象摆脱了与对立面对抗的弱势地位,以反常的姿态具备反抗的能力。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的形象戴凤莲,莫言将妇女解放、追求生命欲望满足的现代化观念加在戴凤莲身上,非常具备吸引读者的魅力。戴凤莲大胆反抗压迫,敢作敢为,追求自己的幸福,热爱生活,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18 - 05 - 29

作者简介:翟星宇(1993 -),吉林扶余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设计,不受任何其他思想的影响,蔑视道德束缚,既不受封建思想对妇女的压迫,也不受近代启蒙思想对人的道德要求,而正是戴凤莲身上具备的现代意识深深地吸引读者,使戴凤莲成为民间人物形象的典型,在她的身上有非常耀眼的光辉,极具“妖魅化”姿态。

戴凤莲的形象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出“妖魅化”人物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由于是作者把妇女解放的新时代的进步思想观念穿越到人物所处的时代,赋予在戴凤莲身上,使这样的人物具有反抗压迫的能力。她对于“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的反抗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父权方面。戴父贪图聘礼将女儿嫁给单家少爷,她就不认这个父亲。对于夫家,戴凤莲更谈不上顺从,她对患麻风病的丈夫无任何好感,余占鳌把单氏父子杀死后,她也无任何悲痛,很快便适应当家的职责。对于爱情的追求更表现出思想的穿越性,大胆接受余占鳌的爱情,当余占鳌变心后,不惜一切手段逼迫他回到自己身边,表现出对情感的热烈追求。戴凤莲掌控自己命运的意识强烈,面对余占鳌以占有者的姿态来到酒坊当伙计时,她不动神色,从容镇定,不让众人看出破绽,而在观察和调教好余占鳌后又热情地接受。她不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成功地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酒坊的当家人。戴凤莲的形象成为了《红高粱》的主要民间人物形象,成为最有灵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使读者改往日对民间传统妇女形象的认识,打破了根植于民间妇女三从四德、愚昧落后的传统形象,填补民间妇女形象塑造的形象空白,使民间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戴凤莲是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塑造的民间英雄形象,而有伟绩的英雄依旧是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具备不属于她的思想。戴凤莲这一形象对抗日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她不但像一般女子在抗日时充当后勤角色,又出谋划策设计堵住鬼子的道路,从而使埋伏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戴凤莲的思想在当代并不少见,很多女性在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后,能力绝不输于男性。而戴凤莲作为年纪轻轻的初嫁女,具有这些独立、自由的现代观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精怪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精怪化”人物强调对外界事物的超常性,其本身有着更多人性,再与非人性的相结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受到老师沈从文写作理念的影响,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从沈从文那里有所继承,沈从文表现的湘西世界就是他意念中的美好世界,是现代社会应该学习和改造的方向,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人性的自然、美好。他说自己的创作理想是“造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为了小说整体的美感而不去写人性中的丑、恶。揭示丑恶不是汪曾祺的志趣所在,他要去描绘恬淡自然、美好纯粹的环境,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丑、恶作为一种底布,以书画的留白艺术让读者阅读时自我填补。

《受戒》中明海及这类形象都是“某种从边缘的社会文化形态中提炼和升华,而生成的主流价值体系缺失的善、美的生命状态。”明海与《受戒》中描写的淳朴的自然风景、淳朴的风土人情融为一体。在传统理念中,身为出家人的明海应该遵循佛道,虔诚地做好和尚的本职工作。但在民间叙事的情境下,作家以超常性的理念附加在主人公明海身上,使明海

成为了人性与非人性的结合物。人性的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小英子的情感,人性本真,他对小英子的情感是真挚的,是喜欢的。当拔荸荠时小英子故意用光脚丫踩明海,明海看到小英子在泥上留下的脚印,心里痒痒的,他和小英子经过寂静无人的芦苇荡时的紧张,都是他心里对小英子情感的反应,这是人正常表现。而非人性的一面则体现在作者描写明海的完美恰似小说中淳朴、自然、美好的民风 and 自然风物,作家没有直接描写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没有人性的扭曲,甚至也没有周围环境恶、丑的浸染,明海身上充满美好的品质,有一副亮堂的好嗓子和俊美的外貌,使得他成为沙弥尾的候选人,他成为集善、美于一身的“精怪化”人物。但这种人物形象却与现实中的人物不符,使得作家蒙上一味寻求文化纯朴自然的“根”而忘却现实主义色彩的嫌疑,这类创作手法总有空想乌托邦的韵味,在给读者美好感觉的同时,美好形象的背后留给读者更多的是夸张和模式化的感觉。

二、民间人物形象塑造的目的

大部分民间人物形象塑造都源于作者的理念,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可谓优劣共存。作家塑造民间人物形象优势在于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社会突出问题,这类形象具有吸引读者的魅力,表达了民间真实的生命欲望和欲望背后的生命系统,也是作者自我观念的表达。劣势在于这类形象存在非人性的因素,过于完美化的人物会影响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和揭示问题的深度。

1、暴露民间突出的社会问题

作者创作出“妖魅化”人物形象,意在揭露社会现象的不合理、违背人性,以反常的姿态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当正常的生命欲求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表达和满足时,很多作家通过塑造这类形象来表达。《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正是表达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压抑的生命意志,成了男人的附属品,父亲以聘礼的形式把自己“出卖”到夫家,变成生育儿女的工具,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女性要想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幸福几乎是天方夜谭,这样的生存困境被作者生动地表达出来。

汪曾祺通过《受戒》成功地表达了某种不受社会制度规范、纯朴而自然的人性美,这样的人物形象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正是因为现代城市文明的环境中,人的自然本性被压抑,产生了病态的心理。从人物形象生成的角度来看,人物形象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创造出来。作者在创作之初,人物是为表达某种社会问题而产生,承载了作者的理念,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的不够,人物思想性格的生成与说服力不够,艺术感染力不强。“妖魅化”人物主要是人物不受环境的限制和制约,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或能力。“精怪化”人物则是在某种边缘化的或底层的环境中演化出了超越环境的品质或能力。所以,“妖”“精”化人物除了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之外,真实的人性还应该是善与恶并存,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魅性的民间人物形象几乎都是善良的、维护自己合理的欲求。恶劣环境、命运多舛、沉重打击并没有造成人性的异化,他们都有着神秘的力量。

2、作者自我观念的表达

依靠观念化产生的民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主要传达的观念是单一的,缺少不同观念的对话,不会出现西方小说中不同人物思想构成的“复调”,在其他人物的言行、价值选择中也传达作者的观点,他们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

汪曾祺因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在文革后受到影响,政治风云的变化,使他的写作远离喧嚣的现实,而向记忆深处寻找温暖的回忆,以此作为对自己心灵的慰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作品主要以民国时期生活为背景,寻找记忆中的温情,其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不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受戒》中的和尚们出家只作为一种职业,清规戒律无人提起,自然不会和人性发生冲突,如写到荸荠庵的和尚们吃肉不瞒人,过年也杀猪,唯一不同的是在杀猪之前要念一道“往生咒”替猪超生,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打牌、吸水烟,经济来源是做法事、放债、出租田地。过的是平常人的生活,有的娶妻,有的有情人,人们也能接受。这些对明海、小英子俩人的关系产生自然的影响,小英子对这段感情也是顺其自然,既不放任追求,也不为条条框框所束缚,大英子要绣新花样,正好明海会画,小英子就推荐明海,明海帮小英子家打场,亮堂的嗓子,让小英子骄傲。小英子家与荸荠庵比邻而居,当然小英子的家人也都品行美好,勤劳善良,明海帮助小英子家干活顺理成章,融入到小英子家里的生活,获得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好感。汪曾祺就是要通过明海来表达寻找远离喧嚣、超脱自然的美好观念。

三、民间人物形象的效用

虽然这类形象存在诸多问题,存在过于完美、“非人化”等问题,违背了文学创造人物形象的客观艺术规律。但是民间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出了作者对于民间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用和负面效用。

1、自然生命意识的彰显

寻根小说家们的创作过于追求自然,将最美好的形象付诸于民间人物之中,通过人物展现自然生命意识。这种回避现实的做法自然与主流话语相悖,他们总把目光放在主流之外的偏远地区,企图在民间生活中寻找自然的、人性的、灵动的东西。于是,“‘寻根’小说家们便不约而同地回避以现实关注和政治叙事放在原始的边地或自然的乡村。”^[5]以此来追寻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而自然生命意识,即自然性,是人的先天属性。它与人的社会性等后天属性相对。完整的人性都是自然性、社会性的矛盾统一。塑造人物形象只关注一方面的属性、或者只关注矛盾性都不是审美内容丰富的形象。在官方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民间形象表现出主体性的缺失,关注于人物的社会性,缺乏对其生命意识的阐述,在寻根小说的民间主体形象中比如戴凤莲、明海彰显了人物的自然生命意识,戴凤莲等民间主体形象充分表达了民间的生命欲求和这种欲求背后的复杂系统,给人以张扬恣肆的审美享受,这也符合民间“自由自在”的审美特质。

2、造成当代意识的缺失

由于作家们缺乏对民间生活的切身体验,以记忆和想象两条虚构的方法进行民间人物塑造,导致未涉实践、概念先行的创作,致使民间人物形象塑造现实依据不足,在小说中

没有按照艺术的规律为最高原则进行塑造,而是由作者控制。作家们总是一味地寻求文化的“根”,追寻最原始完美自然的东西,势必会表现出当代意识的衰退,“在现代性面前,寻根文学的文化寻根甚至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让民俗文化中的‘祸根’在现代社会中逆袭。画地为牢的寻根文学‘民俗’叙事尚未完成民俗文化现代性反思与本土文化重构的初衷。”作家们通过民间人物形象来寻“根”,虽然取材于民间生活进行创作,但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作家改造过的,想象而成的,自然有所弊端。另外,虽然新时期以来,小说普遍表现为历史叙事比当代叙事成功,但作家们总是关注于民间,很容易造成与当代主流脱轨,失去当代意识。八十年代国外各种创作流派涌入中国,而此时众多读者纷纷远离文学阅读的时代,无论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还是现实主义冲击波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这些流派都似有似无地偏离了现实主义精神。但是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始终应该是文学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旋律。现实主义精神在于取材于生活的现实、创作遵循艺术的真实,作家坚持的批判精神和表现人类共同的理想。寻根作家们只有把个人理念强加给人物身上减少,更多地切身深入民间,停止观念先行的现象发生,才有可能真正地找到文学的“根”。

四、结语

九十年代讨论的民间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不同作家在三者之中有交叉叙事的倾向,甚至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也有叙事话语的嬗变。寻根小说中塑造的民间人物形象,从人物形象生成的角度看是依靠观念产生。但是这种创作方式一般不被学术界认可,从创作实践上看,具体的艺术价值根据其所处时段和反映问题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从表达的作者理想人格方面看,表达效果确实是显著的,这类民间人物形象确实承载了相应的使命,表达了民间某种问题和现象,并引发人们对民间的深入认识和思考。但是在创造民间人物形象时,更多作家们在写作时大多倾向于向历史寻找素材,通过记忆和想象进行写作,揭示民间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但缺乏冷静深沉的批判精神,造成当代意识的缺失。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68.
- [2]姚晓雷.新时期以来文学中非常态民间主体形象塑造[J].文学评论,2015(2):130.
- [3]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8.
- [4]姚晓雷.新时期以来文学中非常态民间主体形象塑造[J].文学评论,2015(2):131.
- [5]王东.民间传统与地域风情.“寻根文学”中的传奇叙事[M].文艺争鸣,2015(12):164.
- [6]杨国伟.寻根文学“民俗”叙事的现代性批判[J].理论月刊,2017(9):77.